第二部

从群体到历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
论群体——作为必然的自由和作为自由的必然的等值——任何一种唯实论辩证法的范围和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群体的必然性并非先验地在某种集合中产生。相反，我们在前文中指出，集合可以通过其系列的统一（作为系列的否定统一可以像抽象的否定那样同系列性相对立）来为各个成员组成一个群体的可能性提供基本的条件。但是，这仍然是一种抽象。不言而喻，在一超验论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容易。人们会看到整体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每个有机组织都遏制并控制着其无机的多元性在社会多元性的层次上进行个体融入有机整体的变化。这样，与个体的有机组织相比，群体就会起到一个超有机体（hyperorganisme）的作用。这种有机论唯心主义，在过去总是作为保守思想的社会典范不断重现（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它同自由主义原子说相对立；在 1860 年以后，它企图使各个阶级组织在全国团结中分裂）。但是，如果认为有机论的幻想只能起到反动理论的作用，那将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不难看到，群体的有机性——也就是它在生物学上的统一——显然是经验的某一契机。我们涉及的是辩证经验的第三阶段，所以我们要说，当群体在实践—惰性场域中产生并反对这个场域时，有机结构首先是群体

虚幻的和直接的表象。

马克·布洛赫在两部出色的著作中表明，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奴隶阶级——仅以这三个阶级为例子——在十七世纪乃至在此之前，如果说不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的话，也至少是一种事实的存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这些是集合体。但是，富裕的资产者作为个人为加入贵族阶级而作出的不断努力，使贵族阶级抱得更紧：它从事实的地位过渡到法律的地位；通过共同的行动，它把苛刻的条件强加给希望进入骑士圈的人们，这样就使这个各代人之间的中介机构变为筛选机构。只是与此同时，它也决定了奴隶的阶级意识。只要城堡主们尚未在法律上统一，每个奴隶就会把自己的状况看作是个人的命运，他承受这种状况就像承受同一个地主家庭的人际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就像承受一个意外事件。但是，贵族阶级在为自身而存在的同时，因这一事实（ipso facto）而构成法律制度上的奴役，并使奴隶们看到了他们的互换性、他们共同的无能和他们共同的利益。这种揭示是决定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发生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这个例子的目的只是在于表明，在历史的运动中，一个剥削阶级在加强自身的联系来对付敌人和意识到自己是休戚相关的个人的统一体的同时，如何向被剥削的阶级显示他们的物质存在是集合体，是为在其成员之间建立休戚相关的实际联系而进行持续尝试的起点。这一点毫不奇怪：在这个不断被反目的性的巨大运动转动的惰性准整体中，历史的集合性和辩证的规律在起作用。一个群体作为休戚相关的整体，它的构成（当然是在现实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中带有辩证结果，即将其变为社会场域的其余部分的否定，因此，也就在这个被确定为非群体的（non—groupe）场域中产生适合于对立集团的条件（所有这些是在罕见的基础之上，发生在分裂的社会制度之中）。但是，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在外部的非群体对群体的态度，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把群体看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任何新的集体组织都可以在任何一个更老的组织中找到自己的原型，因为统一实践场域的实践在客观上加强了群体—客观的联系。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行为在同外部的集合体发生关系时，竟把它们看作是一些有机体。例如，丑恶(scandale)的结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被看作整体的集合体。在剧院里，每个人面对着一个场景中他认为是丑恶的每段台词，实际上是受到邻座的观众们的系列反应的影响，丑恶是作为一个系列程式的他人。但是，一旦丑恶的最初表现(即作为他人而不作为自我、为他人而行动的那个人的最初行为)产生了，它们就是全体观众反对作者的生动统一，这只是因为每一个用个人的统一来表示的人在超验性中为每个人实现了这种统一。不过，每个人的身上仍然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因为这种统一是所有他人(包括他自己)作为他人并通过一个他人的统一：表示异议者并没有揭示或表达公众的看法：他在一个直接的行动(叫喊、辱骂等)的客观统一中所表达的东西，对每个人来说还只是他人的看法，即他们转变的和系列的统一。但是，丑恶一旦被叙述和评论，它在所有并未耳闻目睹这种丑恶的人们的眼中，就成为一个综合事件的出现，使那天晚上观看这出戏的观众具有一个有机的临时统一性。如果我们用非群体对它们所揭示的群体的无能来确定表现为集合体的非群体的地位，那么一切就会十分清楚。如果群体通过其实践的统一把它们确定在无机的惰性之中，它们就会通过它们个人实践具有统一性的自由统一，以那种基本上是机构的暂时实践的自由综合为模式，来理解它的目的和统一性。确实，在实践场域中，一切外部多元复合性都会成为每个人进行统一综合的客体(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综合的结果是掩盖集合的系列结构)，但是，我统一在实践场域中的群体是作为群体作为已经统一的事物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具有一定结构的事物，这种结构是基本上摆脱了我的统一并否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种统一的统一体（因为它是使我陷入无能的实践）所赋予的。这种摆脱了我的积极的、自由的统一性表现为一种实在的实体，我在自己感觉的实践场域中只统一了这种实在的多元复合性，把它看作纯粹是表面的物质性：换言之，我并不把惰性——它必然是群体的实在基础（如同被超越和被保存的惰性一样）——纳入积极的共同体之中；恰恰相反，是我的实践把它重新纳入自己的统一运动之中。而摆脱了我的共同行动变成了这种表象的实在，也就是实践的综合实体，是控制着其各个部分的整体，是隐德来希（entéléchie）[①]，是生命。在感觉的另一层次上，对于另一些群体来说，则是格式塔。我们将在下文中把这一幼稚的有机论看作个体和群体的直接联系，看作绝对完整化的典范。在这里，只是要摒弃有机论的所有形式。在任何情况下，群体——作为一个集合体的规定性和作为重新落入集合体中的永恒威胁——和作为复合性的惰性的关系，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归结为有机体和构成有机体的无机实体的关系。

但是，如果反辩证法的契机自身已成为实践场域中的辩证法，而像共同的实践那样构成的辩证法之间的中介的辩证过程并不存在，那么群体的出现是否包含着它本身的可理解性？我们将根据我们在此以前使用过的方法，竭力在研究中发现聚集在某种过程的性质和契机，这样做只有一种纯粹批判的意图，即确定它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将要在研究中依次考察群体的产生和它们的实践的结构——换句话说，集体行动的辩证合理性。最后研究作为激情的群体，这是因为它在自身中同影响它的实践惰性（l'inertie pratique）进行斗争的缘故。

①隐德来希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用语，意思是“潜势力”。——译者注

1. 并合中的群体

我预先要提出两点看法。首先一点是：我们曾经说过，具有系列性结构的惰性集合是社会性的基本类型。但是，我并非从历史意义的角度来指出这一点，而“基本的”这个词在这里不表示它暂时的优先地位。谁能肯定集合体先于群体呢？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提出任何假设：说得更清楚一些，尽管有史前学和人种学的种种材料，任何假设都没有意义。另外，从集合到群体和从群体到集合的经常性变化，会使人无法先验地确定某个集合究竟是历史上最初的实在，还是一个被消极场域收回的群体的残余。在每一种情况下，只有对先前的结构和条件进行研究才能作出回答——如果研究能做到这点的话。我们提出集合体在时间上是领先的，这一点符合逻辑，理由十分简单：根据历史事实，群体是作为集合体的规定性和否定而形成的。换句话说，群体超越并保存了集合体。相反，集合体即使产生于那些活动中的群体的裂变，作为集合体却并不保存这些群体的任何东西，除非是一些不能很好掩盖系列性流失的已经陈旧作古的结构。同样，无论何种群体，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它重新落在集合的惰性存在之中的理由：这样，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一个群体的裂变具有一种先验的可理解性。但是，与此相反,集合体——作为集合体并在我们将要寻求的因素不发生行动的情况下——至多只包含其成员的综合结合的可能性。最后，不管史前学如何说，在一个由阶级斗争来决定的历史中，重要的是指出被压迫阶级从集合体状态向群体的革命实践的过渡。这点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这种过渡事实上已在每一种情况下发生。

但是，既然我们谈到了阶级关系，我的第二点看法是，把这些

阶级也看作群体还为时过早。为了确定可理解性的条件，我们就像在研究集合体时一样，将试图理解和研究一些迅速形成、迅速解体的短暂的表面群体，以便逐渐涉及社会的基本群体。

需要的作用

通过闪电般的共同实践使集合体分崩离析的动乱的根源，显然是一种综合的、因而也是物质的变革。这种变革十分罕见，它发生在现存结构的范围之内：对于一些风险和实践运动同痛苦一样都存在于需要（besoin）之中的有机体来说，事件-动力（événement-moteur）就是在物质性各种层次上的危险（或者是饥荒、或者是其含义为饥荒的破产，等等）或工具性的变革（对工具的需要和它的匮乏取代了需求的直接客体的匮乏，对工具的改良在上行意义上被理解为对集合体的必要改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作为相对于自然界而处于劣势关系的需求的原始压力，变化就不会发生，反之亦然。任何层次上的共同实践都不存在，因为实践的逆退意义或下行意义同这种原始的压力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首先必须认为，从集合体到群体的重新组构的根源，是一个复杂的事实，这个事实同时发生在物质化的各个阶段，但在系列统一的层次上，在组织实践中被超越。不过，事件虽然有普遍性，但只有在它的普遍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对象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它在每个人中建立一种统一的对象结构的时候，事件才能被感受为它自己对众人的统一性的超越。确实，到此为止——在集合体的维度之中——实在（réel）是用它的不可能性来确定的。人们所说的对实在的感觉，有其十分确定的含义；从原则上说，是对被禁止的东西的感觉。因此，变革发生在不可能性本身是不可能的时候，或者说，发生在综

合事件把变化的不可能性展示为生活的不可能性的时候。[①]其直接的结果是把变化的不可能性变成为生命的继续必须超越的客体。换句话说，我们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群体的形成从一种共同的需要或危险开始，并由决定其共同实践的共同目标来确定；但是，如果一个共同体在成为共同体时不能感到个体的需要是共同的，不能把自己投身到朝着它产生的共同目标进行共同整体化的内部统一之中，那么，无论是共同的需要，还是共同的实践，或是共同的目标，都不能确定这个共同体。没有饥荒，这个群体就不会形成：但是，它怎么会被确定为反对一个共同需要的共同斗争呢？为什么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个人——由于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并没有像狗一样来争夺食物呢？这就等于在问，当综合统一能力既到处都有（在所有的个体中作为场域的自由统一），又到处没有（如果是个体统一多元复合性的自由的超验性统一）的时候，综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确实不能忘记，作为自身之外的多元统一的共同客体，首先是系列统一的生产者，而集合体的反辩证结构或相异性（altérité），就是在这种双重规定性的基础上产生。

①不言而喻，钓鱼爱好者组成自己的联谊会，或者老小姐们搞一个“流动图书馆”，并不是在死亡危险的威胁之下。但是，这些群体——它们倒是顺应非常实在的需要，它们的客观意义符合总体的状况——是上层建筑，或者说，是在集合体重新组合的经常不断的活动中组成的群体（阶级结构——阶级反对阶级——国家或国际组织等）。从各种辩证法的重新组合阶段到来时起，综合活动本身就成为次要群体的因素、环境和理由。这些群体是活动的生动规定性，因此也是活动的否定；但是，它们同时又完全容纳了活动，它们的辩证冲突在活动中并通过活动而产生。正如《方法问题》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以由此对群体进行研究，或者是横向的（和经验主义的）研究，在群体结构已经客观地显示出来的环境中让群体进行自我确定，或者是纵向的研究，让每个群体在其具体的丰富多采之中表达人类所有的物质性和所有的历史过程。因此，我在这里要论述的，就只有作为实践对集合体的征服或再征服的多元复合性的基本事实。——作者注

但是，正是这后一种看法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如果说客体本身确实是作为集合体中个体之间的相异性联系而产生的，那么，多元复合的系列结构实际上取决于客体的基本性质和它同全体及每个人的原始关系。全部生产资料作为他人的财富，就是这样把系列性原始结构指定给无产阶级，因为这个整体是作为客体的不确定集合而产生的，其需求本身反映了作为他人系列性的资产阶级的要求（demande）。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可以在经验中看到共同的客体通过自己并在实践—惰性场域中组成一个整体的雏形（作为他人通过物质对多元复合性的整体化），并且可以考虑这些客体是否也应该构成作为系列性而成为目标的多元复合。

在一个敌对的实践的压力下对系列的否定

从 7 月 12 日起，[①]巴黎人民处于起义的状态。他们的愤怒有着深刻的原因，但在此之前，民众阶级愤怒只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无能（寒冷、饥饿等等，对一切都是逆来顺受，这种系列行为被误认为个人的美德，或者在无组织的发作和骚乱中表现出来，等等）。群体是通过何种外部条件形成的？首先（我在此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是因为一个机构性的实践群体，即根据国王的规定形成的巴黎选民，由于要不顾或反对这些规定而一直进行磋商，就把巴黎人民的惰性集合说成是在集体实践的维度中具有一种实际的现实性：选民聚会是作为惰性集合在自身之外的自由中存在的积极统一。不管怎样，这种整体化是不够的。其实，代表制在于——用某种方法——把一个积极的群体确定为惰性的集合在无法进入的实践环境

① 指 1789 年 7 月 12 日。——译者注

中的投射。例如，投票选举在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中是一个消极的系列过程。当然，每个选民作为他人并通过多数他人来确定自己的投票；但是，他不是共同地决定自己的投票，也不是把投票作为同多数他人统一的实践来决定，而是让它惰性地通过舆论的系列化来确定。这样，被选出的议会所代表的集合，倘若尚未召开会议，它的成员是一种惰性的相异性的惰性产物，作为各党派数量关系的原来的多元复合性表现了集合体之间的无能关系，而作为这些力量的力量关系则是一些惰性的力量。但是，一旦议会组织起来，一旦它形成了自己的等级制度，一旦它（通过党派的联合）被确定为某个群体（其特点为稳定的多数、围绕游移不定的大多数而进行的复杂竞赛、所有政党合谋反对一个政党，等等），这种真实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投票通过法律、信任投票等等不再只是形式上具有作为孤独的无限相异性的原始选举的面貌，而是作为象征，在数量上表达多数派群体之间的一致、不一致、联合等等）既被看作集合的忠实代表——但它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这样，因为它已经过组织——又被看作它的辩证的有效性。但是，深入研究一个被整体化的虚假统一的集合①（“法国人、你们的政府……等等”），在这种方式之中，人们把集合归结为它无能的地位。法国作为整体是在它之外通过其政府来实现的，这个政府作为国家集合体的自由整体化，使个体摆脱了在聚集中确定他们惰性的社会性的烦恼。因此，如果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不通过新群体的斗争把集合同立法团体和行政权对立起来，那么立法团体和行政权的存在就必然是一种把集合体和惰性联系起来的骗局。权力通过系列的被动性来授予，而我们

①我甚至不是从历史实在的层次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此刻不需要了解政府是否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机构。我只是研究代表的实践和“被代表的”集合之间的形式关系。——作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那儿，在内阁会议主席那儿肯定我们的统一，则会在任何情况下把我们和无限的相异性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巴黎的选民”不一定是实际统一的一个因素。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民众的暴力行为也许甚于政府的暴力行为。然而，只要形势开始在别处显示出统一，他们就可以成为代表，但这时是作为像统一的实践那样要被重新纳入集合中的单位，是作为对无能的否定。

然而，政府从外部把巴黎构成为整体。在 7 月 8 日，米拉波(H. G. Mirabeau)[①] 就在国民议会上指出(但他的讲话立刻传到巴黎人民中间)，有三万五千名士兵分布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还有二万名将要开赴那里。而路易十六对议员们回答说：“我必须使用我的权力来恢复和维持首都的秩序……是这些理由促使我在巴黎周围集结军队。”在 7 月 12 日星期日的早上，市内贴满了“国王圣谕”的布告。布告上说，在巴黎周围集结军队是为了保护城市，使其免遭盗匪骚扰。这样，地点作为实践—惰性压力和在巴黎集合的存在，由一个外部的实践来构成，并组成一个整体。另外，这个整体作为实践的客体(需要包围的城市、需要防止的骚乱)，本身就是实践—惰性场域的一种规定性；城市既是具有被整体化和整体化的外形的地点(围困的威胁把它确定为容器)，又是被军事行为封闭的物质化形式所限定的居民，这种物质化形式使居民成为被关闭的人群。谣言、布告和消息(特别是内克[J. Necker][②]被免职的消息)把共同的决定传达给每个人：他是一种被密封的物质性(matérialité scellée)的粒子。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说，包围的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演说家、政治家。1789 年 7 月上旬，他在国民议会中多次发表演说，要求国王解散在巴黎周围集结的军队。——译者注

② 内克(1732—1180)，法国银行家、国务活动家，曾任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1789 年 7 月 11 日被解除职务，激起了巴士底狱的风暴。——译者注

整体在系列性中的真实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骚动；人们跑到街上，叫喊着，聚集在一起，焚烧市政税收局的栅栏。个体之间的联系是——在个体所能呈现的各种真实的形式之下——作为自身在他人中直接显示的相异性联系。模仿——我曾在别处对此进行描述——是这种准相互性的相异性的一种表现。这种相异性结构是在作为惰性流失的系列性的基础上，通过作为整体（也就是作为国王导政的实践客体；①在这里，由于个体都由他们共同属于同一个城市这一事实来决定，所以这是个摧毁的整体）的共同命运②的行动来组成：军队作为实践单位，威胁要用屠杀的相反命令来摧毁系列性，从而产生了系列性的这种作为在每个人中的否定——不过是可能的否定——来承受的整体。这样，两种结构共存，一种结构是另一种结构可能的和将来的否定（同时也是众人在每个人中的否定）；通过这种共存，每个人继续在他人中看到自己，但在其中看到自己是作为自我，在这里也就是作为巴黎居民在他之中的整体化，方法是用刀砍或枪击来消灭巴黎居民。这种形势产生了人们不恰当地称之为‘传染’或‘模仿’等等的行为。确实，在这些行为中，每个人在他人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并由此在他人的行为中发现自己的行为：在这些还是惰性的运动中模仿，就是同时发现自己，是正在那儿，在他人中作出自己的行动，并在这儿，在自身中作出他

①此外，政府看来并没有确切的意图。政府不大清楚它希望做到什么，也不清楚它能做到什么。但是，这点并不重要：部署军队和开始包围本身就具有客观的意义，就是说它们把巴黎居民指定为一个系统的和综合的歼灭行动的唯一客体。说宫廷里无人希望进行这种屠杀是毫无用处的：在一支军队的总体功能和这种特殊情况的关系中，屠杀自动成为一种直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不再取决于领导层的一种意图。——作者注

②命运作为反对工人阶级（在其系列性结构中）的共同威胁，并不是整体化的，因为这个阶级不是一种有组织的整体化行动的客体；剥削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既作为某个群体有意义的实践来实现，又通过群体对抗的扩散来实现。——作者注

人的行动，逃避他人的逃跑和自己的逃跑，[①]在他人中用自己的拳头进行共同的进攻，既无默契又无协调（这正好与默契相反），而是从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化的综合统一体出发来实现和体验相异性，其来源是一个外部群体（groupe extérieur）的集合。

然后，在巴黎发生了一些事件，地点在各个城门和杜伊勒利（Tuileries）花园，在一些军事小分队和“模仿”的集会之间。因此再次出现了系列的防御性暴力：武器制造者遭到了抢劫。对每分钟日益严重的形势作出的这种革命的回答，当然具有共同的、有组织的行为的历史重要性。但是，这种回答恰恰不是一个行为。它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每个人都决心通过他人找到武器的努力来武装自己，每个人都力图在他人之前达到目的，因为在新出现的匮乏的范围内，每个人为拿到一支枪所作的努力，变成了仍未武装起来的他人的危险；同时，这个行为由模仿和传染的关系构成，每个人通过其模仿他人的方式而处于他人之中：然而，这些暴力的和有效的集合完全是无机的；它们失去了一些统一体，又找回了一些统一体，但在涂尔干所说的它们成员的“机械联带”（solidarité mécanique）中没有任何变化，不过在这里“机械联带”有着不同的含义；另外，它们有可能会为了争夺一支枪立刻打起来（集合体分裂成对立的相互性），如果这种消极活动的含义是革命的，那么首先是因为在一种外部实践的作用下，无能的统一体（即惰性）变成了巨大的人群，成了数目的重力。因为这个在内部还存在相异性结构的人群，在自己的解体中找到了一种可以粉碎武器制造者零星抵抗的不可抗拒的机械力量。但是，不久将要产生群体的革命实践的另一个因素，

①看到别人在跑的人在跑，并不是因为他得知必须做什么：他发现他正在做什么。当然，他只能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发现这一点。我们将在群体关系中再次看到这同一个规律，但其含义恰恰同这一含义相反。——作者注

是武装自己的个体行为，由于本身是一个复杂过程，目的是保护每个人自己的生命，但是它的动力是系列性。最终显现为自己在其结果中转变成自由的双重意义。由于每个人都想保护自己的生命，使自己免遭龙骑兵的伤害，在实践场域中——或者说，由于政府企图执行一种实力政策，由于这种有组织的实践的企图把整个场域确定为实践，其中既有会有助于这种政策的成分，又有会反对这种政策的成分——的结果，是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反对国王。换句话说，政府的政治实践异化了对它实践自由所作的系列化消极反应：确实，按照这种实践的观点，集合的消极活动来自于实践的消极性，惰性的系列性重新出现在作为产生了一个共同行动的统一群体的相异性过程的另一边。这不仅对于知道这一点的军队长官们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巴黎人民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把知道这点作为统一结构的重新内在化。这里的统一性还在别处，即在于过去和将来。它是过去的，因为群体有了一个行为，集合体惊讶地把此事看作它消极活动的一个契机：它曾是群体。这个群体由一个使过程不可逆转的革命行动来确定。它又是将来的，因为武器本身被拿来用于反对一支军队的共同行动，正是它们的物质性中勾勒出一种共同抵抗的可能性。

选民们的不安将在集合内部创造出作为否定性统一体的机构性群体。确实，他们决定重建一支由四万八千名公民组成的民团，并委托各个区来组建，公开的目的是避免动乱。在这个新的时刻，未来的民团看来是在集合中提取并用来反对集合的，而当时大多数居民毫不惧怕“动乱”，而是正确地只把驻扎在首都周围的部队看作真正的危险。当各个区勉强地试图组建民兵的时候，这些正在形成的群体，与代表制的群体不同，反而可以促进集合统一性的产生。确实，“代表制”是作为集合本身在有组织的实践的维度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已经看到，它可以促使集合本身保持惰性；相反，民

团是作为实现集合的实际否定而组织的团体产生的：它将阻止公众集会，解除公民们的武装。由此，它促使向集合揭示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因为它应该用暴力来阻止这个在昨天武装起来、将在明天自卫的被组织起来的人的存在。或者说，这些预先制造的群体是一些在集合中表现为负责保持集合的系列性无能结构的反群体（antigroupes）。通过它们，某个在表现为被否定的东西，应该被阻止的东西。集合的每个成员由于强制性地被确定在其惰性之中，①就把系列性下面的深层统一看作一种不在场，看作一种基本的可能性。同时，民团作为预先制造的群体，本身就代表了集合的综合规定性，虽说这是一种否定的代表。民团在集合中被机构性或半机构性组织从外部加以确定这一事实——由于集合应该是被否定的否定——表现为必须被集合本身从内部用统一手段来摧毁的东西。民团和人民的强烈矛盾，产生在人民的内部，就产生了一个内部统一体作为外在性统一体的否定的可能性。民团由于还是盖在多元复合性上的一个图章，就只能在一个自由的组织中使本身自相矛盾和解体。自由——作为有组织的实践从其真实的目标（对朗贝斯克亲王［prince de C. Lambesc］②的士兵进行自卫）出发的简单的肯定规定性——表现为使必然性解体的必然性。从这点出发，在合法当局和人群之间，一种辩证关系在市府建立起来：当局不愿交出武器，支吾搪塞，想找到脱身之计；人群越来越危险，并通过选民们、巴黎市长等人的行为表现为存在单位。看

① “任何持有武器等的个人，必须立刻将武器送到他所在的区政府……”“……所有公民都不准聚众闹事。”（7 月 13 日国民议会决议）——作者注

② 朗贝斯克（1751－1825），法国元帅。1789 年 7 月 12 日，他下令对聚集在杜伊勒利宫前的人群开枪。——译者注

到弗莱塞尔（J. de Flesselles）[①] 答应给的武器箱里全是破布，人群就认为自己受骗，也就是说，人群把弗莱塞尔的行为内在化，不是在系列性中，而是在反对系列性时把他的行为看作一种消极的综合。确实，欺骗作为方法被置于一种相互性对抗关系的范围内。弗莱塞尔欺骗人群，[②]就使朝相异性的流失具有一种个人的统一，这种个人的统一必然是愤怒的反应的特点，愤怒的反应表达了个人的统一，而对集合本身来说，则是揭示了这种统一。每个人都以一种新的方式作出反应：既不是作为个人，也不是作为他人，而是作为共同人称的特殊体现。这种新的反应本身没有任何神奇之处，它只是表达了一种相互性的重新内在化。

从这一时刻起，某个东西已经产生，这个东西既不是群体，也不是系列，而是马尔罗（A. Malraux）[③]在《希望》（L'Espoir）中所说的世界末日，即系列在并合中的群体中的解体。这个群体还没有一定的结构，就是说完全是不定形的，其特点是作为相异性的直接对立物：确实，在系列关系中，作为系列的理性的统一总是在别处；而在世界末日中，虽然系列性至少是作为即将消灭的过程依然存在，虽说系列性总是可以重新出现，综合统一却总是在这里；或者说，在城市的每个地点、在每一个时刻、在每个部分的过程中，每个部分都全面卷入，城市的运动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终结和意义。蒙儒瓦（F. Montjoye）写道：“将近傍晚时，巴黎成了一个新的城市。不时射出的炮弹提醒居民保持警惕。炮弹的爆炸声和不断发出警报

① 弗莱塞尔（1721－1789），法国行政官员。法国大革命前不久就任巴黎市长，在攻克巴士底狱时被群众杀死。——译者注

②看来他当时是出于好意，但这点并不重要。人群并不是认为自己受骗：人群是受骗的。——作者注

③ 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小说《希望》（1937 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根据他率领国际飞行中队参战的经历写成。——译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